

文艺报

WENYI BAO2010年1月20日 星期三 第1期

一种有刺的野生植物做过我的刑冠也做过我的花冠。我的野刺莲盛开在那最富刺激的年代。

当时,我处在楼梯的最下一级,右派的命运和印度的“不可接触的”贱民差不多,但是,这“死老虎”的身份使我获得了不幸中的万幸,在恐惧笼罩着城市的形势下,我仅仅被逼迫去僻远的山区。其实,这符合我的心愿;在城里,我既要躲避街邻的鄙视和猜疑的目光,也要躲避熟人和朋友的同情,这二者都会遭到横祸,连表情连呼吸都得小心翼翼,所以,我希望被斩伤的根在乡间重新扎下土壤。而我是个世俗的女人,为了充满信心地活下去,需要一种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爱,需要一个忠诚的性灵来分彼此最亲切的思想。我爱着陈萱,对他怀着磁铁般的向往和忧伤,要么获得,要么死去,已经没有别的退路了,然而,爱是奉献,我怎能把我的流放生涯奉献给他?

和陈萱结识于穷途末路,那时,我刚被释放出来,前路茫茫,一筹莫展,好不容易在职工夜校谋得一个临时教书的工作以维持生计,陈萱也在夜校任课。我早就听说过他的身世,4岁死了父亲,母亲守寡将他 and 妹妹养大,三人每餐共吃一片腐乳或一碗白菜。他的童年是在漫长的幻想和严格的自学中度过的,10岁就开始在印刷厂做学徒,用妈妈给他买蚕豆的钱去看连环画,从躲在碎纸堆里读辞典入门,自学数学,经过有关方面的考核,达到大学数学本科毕业水平,而且酷爱文学。他的事迹上过报刊,因而结识了几个新闻界的大朋友。后来,这些人落难,他请他们在城郊小店饮酒,作了一首《定风波》:

楼上青旗向我招,故人相对在尘嚣,坐块胸中浇不尽,谁信,当年豪气未全消。豪气三分还几许,细数,一分摧折一分抛。尚有一分豪气在,留待,明朝慷慨忆今朝。

《定风波》的流传引起了风波,陈萱背上了“同情右派”的罪名,被迫“自动”离职,来到夜校教高等数学。每次下课后,他总是和我一道走,海阔天空,什么都说,我倾听他的谈话,犹如倾听自己的思想,我觉得再没有另一个人的气质比他和我更相近的知己。但陈萱总是带着我绕那些弯弯曲曲的小巷,以便延长谈话的时间。他说他听说过我从四川逃到湘南参加游击队的故事,后来又怎样为诗而蒙难,还晓得我醉心于乔治·桑和雨果,以及从前在周末晚上穿过什么样的裙子。他不相信一座熄火山的完全冷却,认为我对生活仍然满怀热望。我听着他,暗自庆幸,这个人就是我多年来寻求的知己。但我审视着这个人的感情,是不是因为孤独因为生活的谬误百出而恋爱呢?万一盲目地打开了爱情的门,友谊就会从窗口跑掉。我保持着一步远的距离,边走边谈,各人手中提着一个装教案和学员作业的包包。

朦胧夜色涌出了一轮明月,我们终于开始如下的对话:

我:“你为什么知我这样深?”他:“早在相识以前,你就来到我梦中,我的记忆里储藏着你 的忧患和欢乐。”我:“像你这样有为的青年,一般都不会与我这种落魄的人交往。”他:“我不是样品,我是我。”我:“我是‘右派’,你不怕受连累?”他:“你同我在,地狱也是天堂!”我:“我青春将逝,又长得 不美。”他:“有些人的魅力甚至超过美。”无须再问了,再问一句就是矫情了。我抬头望他,他正凝视着我。

从此,我们越过一步的距离,依然走在那些弯

野 刺 莲

□郑 玲

弯弯曲曲的小路上,我系着一张晚霞色的披巾,每当自己感到夜凉露冷之时,便解下来围住他的颈项。一首诗在我心底荡漾,25年之后才写出来发表。

假如火山爆发
这座城市
是在我们相逢之日诞生的
是我们走成了美丽的街道
看蓝了江水
造一个天空
伸向高远

假若城外的火山
突然爆发
两千年后
我们依然这样手挽着手
从废墟中走出来
在月光下穿城而过
我依然用我的这张披巾
为你遮住深夜的寒露

很长一段时间,我们总是这样走着谈话,现时年轻人所享受的影剧院、音乐舞厅,我们当时是不敢企望的。有一次,到一家小店去吃饭,他郑重地把俩人的提包叠在一起,自言自语地说:“哪一天我把这两个包包都提回家里去就好了!”这句话使我感到再一次诞生。“家”,这间间最温馨的字眼,明亮如雪原上的一树红梅。

不久,我面临流放的厄运,更需要一个家了,爱的雄心使陈萱坚定无比,他要与我同住,他要给我一个家。但是,我痛切地感到这样做不行,他的牺牲太大了, 还有他母亲的孤独和眼泪我又将怎样承受?这拥抱幸福之前的精神重压使我差点崩溃,我神思恍惚地试着与他诀别。

那夜,我们相约城郊,乌云森森,月在天外,成群的流萤明明灭灭,绕着我们飞逝,像一支不可见的手从废墟的灰烬中煽起的漫天星火,造成一种又魔幻又凄凉的气氛,使我们怎么也走不出这座愁城,便在一处坐下,以为坐在桥头。桥是连接的象征,也是分离的阳关,我如痴如醉,不知道说了些什么诀别的话。翌日,我发现象牙发夹丢了,它是远在四川的妈妈给的惟一念物,又约陈萱同去寻找,结果在一座荒冢的草丛找到了,原来当时我们是坐在一个非人间的幽处。我更为疑惧,觉得兆头不好。陈萱则为此写了一首诗(可惜原稿后来烧毁了,爱情毕竟只是俩人之间的秘密),意思是对我说那坟墓中埋葬着一对被拆散的恋人,饮恨终生,死后才得以相聚。你今天为什么要屈从于人们的偏见,为什么要看重不正当的毁誉?为什么不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?爱是深深的理解和接受,你为什么理解了却不敢接受?你有力量使我幸福,为什么不把幸福给我,却去帮助世俗的偏见扼杀你所爱的人的意志,为一个抽象的观念轻易地把幸福毁灭?

这一连串的为什么,如一股湍流,冲击着我的灵魂,提升了我的精神,使我的痛苦辉煌。我记起了尤金·奥尼尔的话:“过去和未来都只能是奇异的插曲,只有现在才是人生。”我必须把握现在,寻找与相爱的人结合的机缘。如果我放弃了与命运的斗争,时过境迁,将来就只有徒然的后悔、徒然的渴望了。于是,我同意他申请下乡。他的某些亲戚和某些同事猜到了他急于下乡的秘密,有的瞪目结舌;有的勃然大怒,甚至断交,认为他和一个女右派结婚实有辱亲朋,何况还要下乡去自寻毁灭。而他的母亲千愁万绪,忍隐着揪心的痛苦。她是个幻想型的慈爱的旧式女性,怀疑我是个女巫,把他儿

喂猪的具体做法。农妇发现了一个很实用的作用——玉米芯能喂猪。

实际主义让人类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了男权中心的历史,人吃和猪吃,两样光景,男人和女人的思想就这样生活得剥离开来。农妇们说:“说了不能喂猪,咱就种玉米罢。”

40多年后的今天,我看到泥土上大面积生长着玉米时,对土地的感动不仅仅是敬重庄稼人的勤勉,也有对有限“家底”实际认识,决不盲崇的农妇们满怀的敬意,生活所赐予的幸福是极本色的,精细节俭,许多时候人们企图进入的就是这个境界。但是,却没有农妇的实际表达更深入人心。

其实在1955年以前我们的土地上生长的玉米就长势良好,只不过1955年要求种植的是“金皇后”种子。比往年种的“小粒红”更“早熟、丰产”。这一年农民提出了一个很专业性的口号:“加强玉米亲本的选择”,是说,要选择品质好、成熟早、适宜当地生长条件,而且亲缘交远,类型不同的品种进行杂交,如,硬粒种玉米与马齿种杂交,以便粒种作母本,马齿种金皇后作父本,找父母本生长期相同的亲本籽粒下种,如果父母本生长期不同,要分期播种,以延长父本的散粉期,这也许就是玉米的爱情,虽然让人类的感官多了一些非想,却让我们的嘴巴涌出了一股丰收的暖热。在北方,玉米能伸展农民的好心情,它在挑出嫩芽儿的第一天,不光是人,鸡鸣狗啦的都去看玉米的绿。玉米的爱情结晶不是说出了芽就是儿辈,要长穗。穗饱,人眼儿看着就金贵,就扎眼。这样,才够美。

玉米的神秘让太行山一位全国劳模心生出了朝霞。1955年的秋天,全国劳模聚集在祖国的心脏北京开经验交流大会。太行山平顺县的全 国劳模郭玉恩在北京城里的农展馆看到了他从没有见过的玉米。长了七穗的玉米让郭玉恩嘴巴长时间不能合

- 陈世旭《庐山瀑布云》(小说) 6版
- 何玉茹《我们家的男人》(小说) 6版
- 陈肖人《磨洗麻子畜那段历史》 7版
- 刘兆林《庐山文学真面目》 7版

子踩在雪地上的足印刮下来缝在内衣上,让他跟着我走(后来,我们一家团聚时,她笑着说自己的疑虑,我犹为她当时的忧伤心疼不已)。

我们分头下乡,然后在乡下会合,正逢省会的一位精明干练的富有人情味的区长下乡视察,了解到我们的情况,慨然成全,但必须搬到深山的最深处。他在便条上写下“指令”：“搬家之日,便是结婚之时。”我们感恩不尽,挑着简陋的衣物和沉重的书籍,到小镇上领了结婚证书,走几十里崎岖的包谷路去找我们的家。

那是一座年久失修的谷仓,在村尾。楼上楼下空荡荡的,只有老鼠出没和蜘蛛张网。墙壁很高,墙上有炮眼,早些年山民械斗或与土匪火拼的时刻,那些炮眼冒过硝烟,染过鲜血。指定给我们的床,对着一扇小木窗,窗外杂木丛生,连接着树林森森的后山,听得见野兽的咆哮或叹息,听说还有眼镜蛇作祟。不知怎的,我们一点也不毛骨悚然,反而有一种归宿感,放下担子就开始打扫新房,背着整个世界举行我们的婚礼。

没有红烛没有酒,甚至无钱买一束丝线,但是我们找到了比常规的喜庆之物更为喜庆的东西。此时正值早春,迎着料峭的春寒,有种野生植物的叶子长得真快,宛若无数绿色的蝴蝶一下子飞来停在满是尖刺的枝条上,叶簇中间托着一朵紫繁花,润泽的白、贞洁的白,散发出莲荷的清香。也许是陈萱从它闻到生命最美妙的跃动吧,冒着风雨采了一丛插在瓶子里,誉为“野刺莲”。没有桌子,他搬来一个大树桩,在上面安放一块平整的白石,我把花搁在上面,这就是白石为盟、鲜花为证了。

那一夜,雨停了,山泉流泻,谷底是苦的,浪花是甜的,野刺莲在月色和清风中摇曳,如浪花。

从此,每年的结婚纪念日,陈萱都去采一丛野刺莲。质朴的山民是以人们的行为来判断敌友的,虽然我们也挨过斗、游过街,但是也和他们一起流过汗、受过苦,晚上还教他们认字,给他们包扎伤口。相处久了,有些伯伯娘和嫂子们便来串门,看见我们对野刺莲的虔诚,问供奉的是什么神,陈萱回答说“爱神”。山民并没有听说过爱神,但在他们那里花有花神、树有树精、水有水仙,反正是神,于是相信了,传开了,说岩上的刺藤花是城里人的菩萨,不准牛羊去践踏。

20年前的春天,在我们的银婚纪念日,陈萱送我一串莹白的小珍珠,以代替野刺莲。我们早已返回城市,这里生长野刺莲的郊原逐渐为一栋栋的新楼所覆盖,很难找到了,但它开在我们心中,永远和我们神交。



本版责编：冯德华

拢。郭玉恩想,我们平顺的山地、熟地与冷地,种啥啥不长,农民的口粮不能保证,劳模当得也不踏实,这玉米好啊。

农展馆的服务员发现这个农民天天来看玉米,心中好奇,连带着也多看了几眼玉米。这一看了不得,七穗玉米上如老鼠啃过似的,豁豁溜溜。郭玉恩被扣住了。唧唧的泪水从劳模的脸上漫下来。郭玉恩说:我看到玉米好,这样的长穗能让我们山沟里的农民吃饱。我从看见它的那天起就决心要抠它几粒,抑制不住我自己的思想,我在每穗上都抠了一粒,你逮住我了,逮不住说不定我就抠完了。玉米我不会给你,劳模可以不当。

劳模的“无赖”让农展馆没了法子,批评他头脑里有了杂色,不能做一个心口一致的、纯粹的劳模。劳模顺原路返回太行山的平时时,他想:不当这劳模又能咋!

郭玉恩抠回来的玉米就叫——金皇后。

1955年以后太行山平顺县里的金皇后玉米长势良好。

1955年底,因为农业社扩大高产作物玉米的种植,全国95%的农业社转入高级社,农民们开始着手全面规划于第二、第三五年计划的远景规划。农民们看到了社会主义繁荣幸福的康庄大道。

新作品

杨绛

发刊词

新年伊始,“新作品”专刊与广大读者见面了。作为《文艺报》的别一种创作面貌,“新作品”专刊旨在承接、延续文学质朴、诚实、无止境的理想,刊发有新发现、新创造和新表达的随笔、散文、短篇小说,集纳以文学、文化等社科类人物、事件为主要内容的“记录”专辑,以及萃集国内外文学、文化信息和观点的“文摘”专辑,共四版,每月出版一期。百岁高龄的文学前辈杨绛先生欣然提笔,为“新作品”专刊题写了大方、特重的刊名;书法家沈鹏先生以自己对于文学的热忱和支持题写下富于新意、生意和锐意的短篇小说“新天”专辑刊头;作家莫言先生用左手题写了凝聚内外气力的“团结湖”随笔、散文专辑刊头。在此深致谢意!同时,我们深知这份专刊寄托了文坛艺苑前辈、名家和广大读者的厚爱与厚望。

“新作品”将关注,中国的现实、世界的现实;人的内心的真实感受,当代人与历史的联系。“新作品”将致力于在这个汇集各种言说的时代,寻获一些值得回味与深思的声音。

希望我们的努力能为读者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:什么样的文学和我们真的相关;能看见自己,也能够抬起头看见更多的人;对自己有意义,也能够对别人有意义;尝试去发现隐匿着的、埋伏着的事物的本质,尝试去寻找生活开始的地方,寻找文学开始的地方……

“尽信《书》则不如无《书》”

□王充闾

周武王继位后,察知荒淫无度的殷付王的军队主力远征东夷,都城朝歌空虚,于是率兵征伐,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“牧野之战”。这是一场激烈异常,伤亡重大的战斗,《尚书·武成》篇有“血流漂杵”的记载。

战国时期的孟子,披览至此,大不以为然,说:“尽信《书》,则不如无《书》。吾于《武成》,取二三策而已矣。仁人无敌于天下,以至仁伐至不仁,而何其血之流杵也?”(《孟子·尽心》章句下)这里的“书”,特指《尚书》。(《论语》中有五六处提到“书”,大多数都指《尚书》)(《武成》是其中的一篇。

孟子认为,《尚书》中的记载未可尽信,并举出了具体实例。这一论断得到了后世学者的认同。宋代著名理学家张载、朱熹等,还就此作了进一步的引申与发挥,强调读书要“有疑”,且在“无疑处有疑”;要“濯去旧见以求新意”。

历史是一次性的。当事物成其为历史,作为“曾在”即意味着不复存在,特定的人、事、环境尽数消逝了。未曾“在场”者(时人或后人)在恢复历史原生态过程中,有时就要依据事件的发展规律和人物性格逻辑,进行必要的充实与渲染,其间难免存在不同程度的主观性介入。因此,海德格尔说,历史的真意应是对“曾在的本真可能性”的重演。

古今中外,不存在没有经过处理的史料。这里也包括阅读。由于历史文本是开放的,人们每一次阅读它都是重新加以理解,随着阅读者的差异,存在着阐释的多义性。去年春天,我率领大陆作家代表团访问台湾,到日月潭观光,接待我们的是南投县文化局长,他是一位文学博士。在同我们交谈时,他讲了一件趣闻:

访问日本时,他见到了杨贵妃的墓,便问有关人士“有什么史实依据”,答复是:“你们中国古代的白居易写得清楚嘛!”博士反诘:“杨贵妃不是死在马嵬坡吗?白居易《长恨歌》里分明讲:‘六军不发无奈何,宛转蛾眉马前死。’”答复是:“《长恨歌》里还讲:‘忽闻海上有仙山,山在虚无缥缈间。楼阁玲珑五云起,其中绰约多仙子。中有一人字太真,雪肤花貌参差是。’海上仙山在哪里?就是日本嘛!”博士说:“这种颠倒迷离的仙境,原都出自当事人与诗人的想象。”答复是:“什么不是想象?‘君王掩面’,死的是丫环还是贵妃,谁也没有看清楚;所以说‘马嵬坡下泥土中,不见玉颜空死处。’”

就这样,生生造出一个“贵妃墓”来,结果还振振有辞!

文史作品离不开细节描写,包括一些对话,因为它最能反映人物的情感与个性。《史记》中写汉初名相“万石君”父子三人一门恭谨,就采用了大量细节。石奋的少子石庆,一次驾车出行,皇帝在车上问有几匹马拉车,他原本很清楚,但还是用马鞭子一数过,然后举起手说:“六匹。”小心翼翼,跃然纸上。太史公通过这一细节,写出了当时官场中“临深履薄”、险象环生的政治氛围。

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讲到艺术创造时,谈到了“画”与“化”。画,就是要描绘形象;而化,就是把客观的、物质的东西化作心灵的东西,并设法把这种“心象”化为诗性的文字。这就触及到文史作品中想象与虚构这一颇富争议的话题。历史讲求真实,关于史事的来龙去脉、真实场景,包括人物的音容笑貌、举止行为,都应该据实描绘,不可臆造;可是,实际上却难以做到。国外“新历史主义”的“文学与历史已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”,“历史还原,真相本身也不是一种虚拟”的论点,我们且不去说;这里只就史书之撰作实践而言。

钱钟书先生在《管锥编》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:“《左传》记言而实乃拟言、代言”,“如后世小说、剧本中之对话、独白也。左氏设身处

地,依傍性格身份,假之喉舌,想当然耳”。“上古既无录音之具,又乏速记之方,泐不及舌,而何口角亲切,如聆警歎欤?或为密勿之谈,或乃心口相语,属垣烛隐,何所据依”?原来,“史家追叙真人实事,每须遥体人情,悬想事势,设身局中,潜心腔内,付之度之,以揣以摩,庶几入情合理。盖与小说、院本之臆造人物,虚构境地,不尽同而可相通;记言特其一端”。

大概也正是为此吧,所以,当宋代著名理学家程颐听到弟子问及“《左传》可信否”时,他漫声答曰:“不可全信,信其可信者耳。”

再来看另一部被奉为古代散文之范本——《史记》。《项羽本纪》中记录了“鸿门宴”的座次:项羽和他的叔叔项伯坐在西面,刘邦坐在南面,张良坐在东面,范增坐在北面、之所以如此交代,是因为有范增向项羽递眼色、举玉珥,示意要杀掉刘邦的情节,他们应该靠得很近;还有“项庄舞剑,意在沛公”,而项伯用自己的身体遮蔽刘邦,如果他们离得很远,就无法办到了。司马迁写作《项羽本纪》,距“鸿门宴”大约110多年,当时既没有照像机和录相设备,也不大可能有关于会谈纪要之类的实录,即使有,也不会记载座次。那么他据何而写?显然靠的是想象。

《古文观止》中有一篇《象祠记》,作者为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。当时,贵州灵博山有一座年代久远的象祠,是祀奉古代圣贤舜帝的弟弟象侯的,当地彝民、苗民世代代都非常虔诚地祀奉着。这次应民众的请求,宣慰使重修了象祠,并请流放到这里的王阳明写一篇祠记。对于这位文学大家来说,写一篇祠记,确是立马可就;可是,他却大费踌躇了。原来,据《史记》记载,象为人狂傲骄纵,有恶行种种,他老是想谋害哥哥舜,舜却始终以善意相待,现在,要为象来写祠记,实在难以落笔;歌颂他吧,等于扬恶抑善,会产生负面效应;若是一口回绝,或者据史直书,又不利于民族团结。反复思考之后,他找到了解决办法:判断象的一生分前后两个阶段,前段是个恶人,而后段由于哥哥舜的教诲、感化,使其在封地成为泽被生民的贤者,因此死后,当地民众缅怀遗泽,建祠供奉,《象祠记》就是这样写成的。其中显然有想象成分,但又不是凭空虚构。因为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中,有舜“爱弟弥谨”,“封帝象为诸侯”的记载。据此,作者加以想象、推理,既生面别开,又入情入理。用心可谓良苦。

这在西方也早有先例。古希腊史家修昔底德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》中,演说辞占有四分之一篇幅。修氏自己承认:“我亲自听到的演说辞中的确实词句,我很难记得了,从各种来源告诉我的,人也觉得有同样的困难,所以我的方法是这样的:一方面尽量保持接近实际所讲的话的大意,同时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每个场合所要求他们说出的话来。”

顾颉刚先生在《古史辨》中说:“我以为一种故事的真相究竟如何,当世的人也未必能知道真确,何况我们这些晚辈。”这话不假,我们都看过《罗生门》这部影片,对于事件的真相,在场亲历者言人人殊,以致有人不无夸张地说:“史者,人们口上的一撇一捺也。”看来,坚持历史事件包括细节的绝对真实,“非不为也,实不能也”。

当然,文史作品中的经验性整合与合理的艺术加工,必须建立在尊重客观真实的基础之上,不能像小说那样自由虚构。尤其是关于现实中的亲人、友人、名人的传记以及回忆性、纪念性文章,属于写作者同时代的历史亲历见闻之事,与事涉远古或万里睽隔迥然不同,必须一就是一、二就是二,决不应随意地想象、虚构,须知,这类文字的美学效应,是凭借其丰富而特殊的客观意蕴而实现的,真实与否,关系至大。